

# 綠色的眼淚： 論伊藤永之介的糖業批判小說 〈平地蕃人〉

劉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 中文摘要

1930年伊藤永之介發表於日本的小說〈平地蕃人〉，繼承文協、農組、賴和以降的糖業批判論述，是第一篇有關台灣平地原住民族的小說。本文首先略述故事梗概，透過相似作品的比較，指出該作的衝突高峰和議題核心。包括它與第一篇台灣農民襲警故事——賴和〈一桿「稱仔」〉，及山部歌津子泰雅族巡查補故事《原住民賴薩》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其次，探討作者如何以農民們的「說話體」，與「作者客觀補述」相輔相成，在多族群混雜的社會空間裡，展現出主人公的原住民自覺。第三，比較《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臺灣大眾時報》和當時的糖業研究專書，辨析小說素材來源。最後，比較作者、官方及財閥的「東部開發使命論」之差異，說明伊藤為台灣平地原住民及日本農業移民代言的價值主張。

關鍵字：伊藤永之介、〈平地蕃人〉、臺東製糖株式會社、原住民族、普羅文學

# **Green Tears: On the Critique of the Sugar Industry in Itō Einosuke's Novel “Flatland Aboriginals”**

Liu, Liu ShuChi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1930, Itō Einosuke published the novel “Flatland Aboriginals” in Japan, which inherited critical discourses on the sugar industry from the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Taiwan Farmers’ Association, Lai Ho and others. It is the first novel that focuses on the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 of Taiwan. This paper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story’s synopsis and explores its key conflicts and thematic core through a comparison with similar works. Specifically, it examines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Flatland Aboriginals” and the first Taiwanese farmer-assaulting police story, Lai Ho’s “The ‘Steelyard,’” as well as Yamabe Katsuko’s story about an Atayal assistant patrolman “Aboriginal Laisa.” Next, it explores how the author complements the “speaker’s voice” of the farmers with the “author’s objective narration” to demonstrate the protagonist’s indigenous self-awareness in the mixed social space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Fourth,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ources of the novel’s materials by analyzing the

*Taiwan Daily News*, *Taiwan Min Pao*, *Taiwan People Times*, and books about the studies on the sugar industry at that time. Finally, the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uthor, the official and the zaibatsu's "theories on the mission to develop Eastern Taiwan" to explain Itō's advocacy for the value of representing Taiwan's plain indigenous people and Japanese agricultural immigrants.

**Key words:** Itō Einosuke, "Flatland Aborigines," Taiwan Taitung Sugar Co., Ltd., Indigenous Peoples, Proletarian Literature

# 綠色的眼淚： 論伊藤永之介的糖業批判小說 〈平地蕃人〉<sup>\*</sup>

## 一、前言

1930年12月發表於日本《中央公論》雜誌的〈平地蕃人〉(日文標題：平地蕃人)，是第一篇有關台灣原住民族的小說。作者伊藤永之介(1903-1959)以第三人稱敘事為主軸，穿插主人公「密卡」獨行於田野間未形諸語言的意識流，以及與農民的對話，揭露臺東製糖株式會社卑南工場甘蔗採集區的不義。1928年伊藤加入《文藝戰線》雜誌轉向普羅文學後，大量閱讀殖民地文獻，並在1930年11月、12月相繼發表〈總督府模範竹林〉、〈平地蕃人〉。這兩篇小說不只呼應了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的糖業批判話語，更成為他描寫朝鮮、滿洲等殖民地系列小說的嚆矢。其中的〈平地蕃人〉，處理勞役徵用、土地侵占、農場中的性騷擾、日本移民貧困等議題，提出了民族歧視、強迫勞役、性別暴力、法律不公等值得重視的人權議題。

有關這篇小說的討論不多，林蔚儒、鈴木祐子的碩士論文最為重要<sup>1</sup>。林蔚儒關注伊藤如何描繪台灣風物、混搭語言，刻劃殖民地農民的困境；她認為小說結

---

<sup>\*</sup> 本文原發表於「世界·啟蒙·在地：臺灣文化協會一百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主辦，2021年10月19-20日。投稿期間，感謝多位評審給予指正。

<sup>1</sup> 林蔚儒，〈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伊藤永之介台灣作品〉(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頁54-79。下面引用皆在註腳寫明論文名稱〈帝國左翼與台灣

尾時主人公的回擊雖表現了反抗，卻落入普羅文學的公式。鈴木祐子追溯伊藤的原住民知識來源，證實他參考了森丑之助《台灣蕃族志》（臺北：臨時台灣旧慣調查會，1917年）和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東京：岩波書店，1929年）等書，並藉此推斷〈平地蕃人〉描寫的是卑南族的境遇，傳達了「原住民固有生活因文明人介入而受到危害」的主題。除此之外，河原功也指出楊達與伊藤在東京曾有接觸<sup>2</sup>。

筆者在前述基礎上，企圖釐清〈平地蕃人〉的主要意圖並非反現代性，除了控訴階級壓迫之外，作者的取材與對話有明確的針對性與現實性，主要是反對臺東製糖會社及同時期印刷物上的一些擁糖論述。這篇小說裡細描製糖會社的霸權，鋪陳其如何掠奪土地、剝削原住民勞力、打亂本地族群的生活與生產秩序。他意圖傳達族群支配是階級壓迫的顯著型態，關注平地原住民生產條件的喪失及地景的變貌，認為結構性的霸權已造成族群離散的開始。本文將觀察故事中的內地糖業移民和原住民蔗工，觀察作者如何揭露製糖產業剝削日台農民的現實。

本文首先略述〈平地蕃人〉故事梗概，指出本作的核心議題，包括它與第一篇台灣農民襲警故事賴和〈一桿「稱仔」〉，以及山部歌津子泰雅族巡查補故事《原住民賴薩》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透過不同文本間的相似／模仿關係，包含諷仿、拼貼、呼應、暗指、直接引用、結構對位等，揭露作品間的共通價值與衍生差異<sup>3</sup>。第二，探討作者如何以「農民的說話體」與「作者的客觀補述」相輔相成，在族群混雜的社會空間，展現出主人公的原住民覺知。第三，比較同時期《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臺灣大眾時報》及台灣糖業研究專書，辨析小說素材的來源。最後，比較作者、官方及財閥的「東部開發

---

書寫〉以及頁碼，不再另行說明出處。鈴木祐子，〈日本統治期台灣原住民文學の原典——「魔鳥」「平地蕃人」「蕃人ライサ」の同時代受容分析〉（台北：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年），頁79-130。

<sup>2</sup> 河原功，〈楊達〈送報伏〉的創作背景——從楊達處女作〈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剖面〉與伊藤永之介〈總督府模範竹林〉、〈平地蕃人〉談起〉，收錄於河原功著，張文薰、林蔚儒、鄒易儒譯，《被擺布的台灣文學：審查與抵抗的系譜》（新北：聯經，2017年），頁43-67。

<sup>3</sup> 參見 Kristeva, J,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6.

使命論」之差異，藉此說明伊藤為台灣平地原住民族及日本農業移民代言的價值主張。

## 二、弱者執法：伊藤永之介筆下的卑南族巡查補

一瞬間，總是正面迎視對方的密卡的大眼睛，燃起了憤怒。平常溫順老實，可一旦發怒，最後就會像雙手也拽不住的野牛般，是這個種族特有的、令人畏懼的特質，如今倏地像衝破閘門的洪流似地，從密卡厚實的胸膛直衝腦門。

手中的竹棒就這樣打在胖子毛髮稀疏的（頭蓋）上，發出「啪！啪！」的鈍音。

「太好了！」胖子在那一剎那後好不容易吐出這句話。

（中略）

蔗叢之中四、五個卑屈的移民露出臉來。

「嘻嘻嘻，你可是巡查啲！」胖子奸笑著。

密卡察覺到自己身為巡查補卻動了粗。但他隨即用手上的（竹棒）狠狠地朝著內地胖子（擊下）。<sup>4</sup>

這是〈平地蕃人〉的小說結尾。全篇梗概如下：卑南族巡查補密卡<sup>5</sup>，在甘蔗收割季的秋末衣錦還鄉。作者透過他和「吉田村」日本農業移民、其他平地原住民族的接觸，展示臺東平原上一幅幅貧乏百姓的勞動現場。首先是，早在數年前從內地前來此地謀生的日本農民的窮困潦倒。其次是，平地蕃因縱貫鐵道的修築，

<sup>4</sup> 伊藤永之介，〈平地蕃人〉，《中央公論》45卷12號（1930年12月），頁68-90。收錄於宇野浩二等著，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別卷）》（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頁189-211。本文徵引林蔚儒的中譯本，收錄於〈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頁163。中譯本分布於頁149-163，後續引文直接於文末標示〈平地蕃人〉及頁數。括弧中的復原文字，在《中央公論》的日文初刊本中，以×××（伏字）呈現。

<sup>5</sup> 卑南族男子名中並無「密卡」（Mikar），是作者為與井上伊之助《生蕃記》主人公「密卡」呼應而設計的。有關伊藤刻意使用人物姓名進行互文的部分，參見井上伊之助，《生蕃記》（東京：警醒社書店，1929年），頁1-302；以及，鈴木祐子〈日本統治期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原典——「魔鳥」「平地蕃人」「蕃人ライサ」の同時代受容分析〉（台北：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年），頁89-98。

每日有一千名人夫受徵召，少女萊沙之父也在徵調之列，留下她們母女跟著其他族人去做砍蔗、捆束、接駁、裝填甘蔗上車等「無償性」的勞役。(卑南)族人因臺東廳和卑南工場的勞力徵用導致小米田荒蕪、自家耕牛累死，加上蝗蟲危害而雪上加霜。淺山地區的部落(魯凱族)也被捲入蔗糖生產體制，致有少女淪落臺東賣淫。在此情形下，風雨雷電襲來的午後，原料專員一貫的橫支暴使，使原住民的疲困到達極限，決定集體罷工。專員眼看結隊離去的族人怒不可遏，撲向一直欲染指的萊沙，終於引爆衝突，誘出密卡諫暴的竹棒向專員打去，小說在弱者的執法及可能招致嚴懲的懸念中落幕。

密卡，小說從早熟少年的衣錦還鄉揭開序幕，卻以悲劇告終。在小說線索暗示的1922年，當上巡查補是否稱得上出人頭地呢？這一點可以從臺東平原的部落防衛慣習被警察制度取代的過程來了解。臺東平原又稱卑南平原，是卑南溪到知本溪諸水系的沖積扇，原為阿美族、排灣族、卑南族、魯凱族居住游耕之地，19世紀末葉漸有漢族、平埔族雜居其間。1896年政權轉換階段，阿美族曾參與剿蕩臺東直隸州殘餘清軍，而後譬如馬蘭社(Falangaw)頭目谷拉斯·馬亨亨(Kolas Mahengheng, 1852-1911)等人，被拔擢為統治階層，擁有槍枝協防，並參與國語傳習所設置等諸多公共事務<sup>6</sup>。不過緊鄰廳治的馬蘭社，在總督府實施公共工程或推動新政策時，也被要求提供勞動力或優先落實政策，以致馬蘭社率先受到規訓和監督。此後警察人員成為與社民關係最密切者，在教育、產業、土木、義務勞役方面尤其重要<sup>7</sup>。

小說中提到當時巡查補「過半數是臺灣人和少數的平地蕃」，這是少數提到「臺灣人」(漢人)和唯一提及「平地蕃」之處，於此呈現密卡難以突破的階級宿命——原住民成為巡查補是榮升，但密卡知道這是劣等的榮升：

密卡站在無蓋車下，突然向那男人行禮。儘管密卡已是出人頭地，但他也明白在日本人看來，自己的發跡(出世)不過是「破格的榮譽」罷了，

<sup>6</sup> 1898年4月馬亨亨協助日本當局在馬蘭社成立臺東國語傳習所馬蘭分教場(今台東縣立新生國民小學)，使族人開始接受現代教育。1911年馬亨亨過世後，馬蘭社逐漸沒落。

<sup>7</sup> 李玉芬，《消失中的都市部落？臺東市馬蘭社阿美族生活空間的形成與轉變》(高雄：麗文文化，2007年)，頁139-145。

若因此得罪了日本人，不知道會有多麼不利呢。

男人從無蓋車上俯瞰著密卡，嘿嘿地怪笑著。他在那飽滿福相的耳朵上夾著小小鉛筆，披上漿洗過的黑色斗篷雨衣後，隨即厲聲斥責著。（〈平地蕃人〉，頁158。）

密卡有著反射性的卑劣感，對被授予的「破格的榮譽」感到「次等」的陰影。

密卡受訓一年多後衣錦返鄉，酷似山部歌津子（沖野岩三郎，1876-1956）翌年一月出版的長篇小說《原住民賴薩》（蕃人ライサ）<sup>8</sup>。Lesa'，是泰雅族常見的男子名，《原住民賴薩》中脫穎而出的主人公，最後因父親參與部落襲殺日本人的事件，深陷晉身統治階層或保護民族權益的兩難。以下是賴薩從樟腦會社通譯榮升為監督所巡查補，任職滿月後首次歸家的描寫：

「再見！我告退了！」賴薩說了，走捷徑回家，他從竹林中的繁茂樹木間，飛也似的回去了。他的父親正好從新開墾地回來，站在水池岸，刷刷地洗著農具。賴薩看著其背影，大聲叫他：

「爸爸！我從明天起擔任候補警察……就是巡查補……」

「呃？」父親不相信似的回頭看賴薩。<sup>9</sup>

賴薩歸家的情景與密卡如出一轍。密卡原是製糖會社贊助的教會通譯，由於在各社頭目前，作為卑南派出所的警官口譯受到肯定，從派出所雜役晉升為巡查補。他穿官服走進家門時，作者透過人物間的交叉視線和對話，呈現榮升者與家人關係的微妙變化。父母態度不同，父親的焦慮是重要伏筆：

<sup>8</sup> 兩作開篇在描寫榮升者歸家時，皆營造傳統屋舍內部灰暗的氛圍，對比屋外穿著雪白警官服的青年，突顯其明亮光輝的象徵。其次，作為主人公的新式菁英不免流露出對於傳統生活的隔閡。密卡對於田間歇斯底里的卡姆拉賴伊的妻子難以接近；賴薩覺得母親起居的屋內有股異味。除了場景之外，主題也有相似處，現代性治理對傳統生計與倫理帶來衝擊，使主人公必須在「作為殖民主工具」或「弱者執法」的矛盾中作出天人交戰的選擇。參見山部歌津子，《蕃人ライサ》（東京：銀座書房，1931年），本文徵引版本為河原功監修，下村作次郎解說，《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台灣編】4》（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年），頁1-353。

<sup>9</sup> 山部歌津子著，黃玉燕譯，《原住民賴薩》（高雄：春暉，2011年），頁16。

一位體形碩大的白衣警官從幽暗的門口彎身走了進來。

「是密卡啊。」

屋子裡，正在鋪就的蓆子上將風乾的煙葉一枚一枚並排的母親低聲道。而從剛才就一臉不悅地抽著木頭雕花煙管的哈拔夷，則是目瞪口呆地看向那兒。

那是正寄宿在卑南警官派出所的兒子密卡。

密卡難掩喜悅之情地微笑著，大步靠了過來，腰間的佩劍發出鏗鏘的聲響。

睽違了一年之久的兒子，已經變成一位必須仰視的、身材魁梧的男人。綴著紋章的帽子、雪白的衣服與鞋子、閃閃發亮的佩劍——低矮天花板下吊著的煤油燈燈光，映照著密卡身上的配件。

「變得很威武了啊。我還想是誰呢！」披著鹿皮披肩的母親揉了揉眼角的細紋，眼神裡充滿光輝。——這是那個在甘蔗田裡赤著腳、流著鼻涕追趕牛群的密卡嗎？

「本來打算先通知你們一聲的，不過我忙得抽不開身呢。」密卡聳了聳寬闊的肩膀，強忍住激動，以著與外表不相稱的、十足孩子氣的聲音說道。釘著紋章的全新帽子就像累贅似地，孤伶伶地戴在密卡頭上。（後略）父親哈拔夷則是動也不動地直盯著兒子，眼底閃著懷疑的光芒，習慣性地對警官產生了恐懼。

「怎麼？讓我看你的劍吧。」

儘管哈拔夷對兒子的改變感到動搖，不久還是吃力地起身摸摸那把發亮的劍。但他卻就此不發一語。（〈平地蕃人〉，頁 149。）

哈拔夷 (Abay) 是卑南族常見的名字。作者以對比手法點出榮升者歸家的第一幕，就預示了殖民中間階層與親人的緊張關係。即便哈拔夷想關心久未歸家的密卡，卻對兒子巡查補的身分感到恐懼、懷疑，最後只能陷入沉默。同樣地，賴薩高聲向父親報告他榮升巡查補時，父親也僅是不相信似地望著他，顯現被起用為警吏者，已與象徵傳統文化和律法的父親產生了隔閡。

經過一天巡禮，對比家園的殘敗和運蔗火車的霸氣，密卡看清了製糖會社對當地族群的壓榨。在族人的憤慨即將爆發前，作者巧妙透過人物命名的技巧，利用塔塔拉社<sup>10</sup>的一個小人物「日本」的發言，影射某個社會事件：

雖然他的名字叫做日本<sup>11</sup>，但這並不是他的錯。日本是在還沒有發生×××事件時出生的。（〈平地蕃人〉，頁161。）

伊藤似乎影射了「成廣澳事件」。1911年麻荖漏等阿美族部落襲殺巡查，此一台東史上最大規模的抗日事件，也與長期遭受過度役使有關。小說最後，在火車頭從雨幕中緩緩駛進、原料專員企圖向萊沙伸出魔爪的時刻，密卡終於將族人所受的欺凌還諸其人，毫不顧惜早晨出門前還令他志得意滿的警員身分。

在霧社事件正在處置的階段，伊藤受到《中央公論》邀稿，完成了這篇以平地帶的原住民族不義役使為主題的小說，藉由比起「生蕃」較少受到關心的「平地蕃」議題，伊藤想要傳達——原住民族的壓迫不限於蕃地，普通行政區內與總督府共謀其利的糖業財閥，也已將平地原住民族逼近蜂起的邊緣。

### 三、說話體與客觀補述：位於甘蔗栽培帶的不幸部落

本節將說明集團主義的寫實主義，如何形成伊藤永之介農民文學的特點。

伊藤認為刻劃群體思維時，敘事方法要相應改變。單一視角不足以捕捉群眾全貌，必須採用集團主義的寫實主義，跳脫主人公視角，以群像刻劃和集體對話來推進，再現各種型塑農民性格及驅使其行動的結構，從中掌握該群體的特性和真實生活。這種想法到1936年他推出鳥系列作品時日趨成熟，單一主人公被解構，形成特異的文體<sup>12</sup>。〈平地蕃人〉雖非這樣異色的作品，不過農民們的對話多次補充、辯證主人公視角，已可見到多元視角和對話體的初步應用。

<sup>10</sup> 塔塔拉社：タタラ社（タタラむら），原文加注日語拼音。

<sup>11</sup> 日本（リッボン），原文加注台語拼音。

<sup>12</sup> 1931年日本東北遭逢凶年，伊藤永之介從那時開始關注故鄉秋田縣的農村，經過三年多的田調，在1936年發表「鳥系列作品」。這期間他創造了特異的說話體，〈梟〉是這個系列的開篇，描寫農婦販售私酒無法繳納罰金，淪為勞作場犯人的陰慘生活。第二篇〈鶯〉是對〈梟〉後半段在警察署的觀察，農民以群像登場，包括少女被拐騙到馬戲團等一幕幕離散

伊藤指出群眾的活動、對話及心理無法如實照錄，需要一種「撮要表現的敘述文」，也就是「把會話的要素織入敘述」，這種概念的實踐就是——說話體。它的好處是：「我以為這在沒有特定的主人公，而以描寫群眾為主眼的時候，是最適切的手法。僅把群眾無數的會話的一部（分）大寫，而抹殺其他大部分，這是愚拙的。」為避免平淺，伊藤的作法是把眾多會話綜合為一種象徵性的對話，寫在敘述裡<sup>13</sup>。亦即，把對話綜合壓縮，提高到象徵層次。

不過說話體並非伊藤獨創，安本曾指出它被普羅作家看重而流行的背景：

小說的起源，一般說來是由說話產生的。……脫去了說話的形式而採取了文學的客觀的描寫的形式，這是由於資本主義興盛，隨同技術與科學的發展，文學的描寫也科學化了純客觀化了的原故。近代寫實主義的這種描寫的手法，被作家們加以考慮而疑惑的是最近的事。晚近現實社會的複雜的狀態，從來的描寫法是難以奏功的。……武田麟太郎、高見順、和田傳，以及出征前的火野葦平、中山義秀等人都各自研用著自家的談話體，但其中伊藤永之介則是有著特長的。<sup>14</sup>

說話體在對自然主義的反思中受到左翼文壇注意，經常與地景書寫搭配，前者用來展現社會群體，後者作為承載舞台，促使人物的主觀言談，在典型環境中體現出庶民的普遍意識和訴求。除了社會空間刻劃之外，敘事者全知視角的補述，伊藤所謂的「客觀補述」也不可或缺，才能點明深層的問題及其他文化指涉。

說話體、地景細描加上客觀補述，伊藤用此方法型塑殖民地議題和地方感，呼應了三〇年代日本農民文學的要求。〈平地蕃人〉鳥瞰大正末年臺東平原甘蔗

---

農村的縮圖。第三篇〈燕〉描寫農民搬遷至北海道謀生卻不順，少年逃出工廠、朝鮮婦女脫逃另謀生活等陰慘生活。第四篇〈鴉〉描寫從農村投身工廠的女工，像不吉利的烏鴉飄零無依，墮落為飯館酌婦的坎坷運命。第四篇〈鷗〉是蜷縮在三等船艙出外謀生的男人們，而他們的家鄉正是〈鶯〉、〈燕〉裡的那些農村。鳥系列的共同特徵，是把題名作為內容的象徵，或作為故事中的小道具，伊藤試圖以最底層的農民為對象，從特定時空場面去捕捉農民的生活與人性。安本認為這類作品，在類型上屬於社會小說，在形式上可稱為集團主義的寫實主義。安本，〈現代日本文學的潮流：伊藤永之介農民文學〉，《華文大阪每日》5卷2期（1940年7月），頁16。

<sup>13</sup> 同註12，頁16-17。

<sup>14</sup> 同註12，頁16。原文日文，筆者中譯，文句不順暢處，保留原文樣態。

栽種區的地景變化，並以巡查補的視角、農民的對話，揭開糖業資本主義主宰地方社經結構與族群關係的過程。作者使用客觀補述使農民說話的意旨更為清晰處共有四段：

第一段為密卡行經溪埔，遇到卡姆拉賴伊（Gumalray）的妻子時的插敘：

密卡靠了過去。

耕作小米田不過是兩年前的事。過去部落裡主要的作物是平均二、三甲（一甲約一町步）的水田，臺灣人（漢族）<sup>15</sup>學日本人把旱田改作水田，部落裡的人又加以模仿。有一天，警官拿了張紙片來要求在上頭蓋手印。說是乖乖地把田租給砂糖會社就可以衣食無缺等等。因為他們並不像日本人那麼想要錢，所以誰也不肯答應。警官因此瞪大了眼，說你們自作主張地把天皇的土地闢為田地，有什麼意見的話就給我滾到別處去！不久，不知打哪兒來的內地百姓，任意地將水田改作甘蔗田，那些哭著把田地租給砂糖會社的人於是變得三餐不繼。剛開始，用會社那裡得到的錢可以裝一牛車的米回來，但那些米卻還不到自己田裡收穫的三分之一。過去隨處都可以闢為田地，如今卻得忌憚著警官的視線。前年夏天發生大洪水，水勢兇猛，部落裡的人就用牛車載著犁耙等工具，爭先恐後地趕到洪水帶來肥料的河畔。這裡的話就沒問題了——，這裡也有少部分是密卡家的小米田。（〈平地蕃人〉，頁 151-152。）

此段插敘用密卡的意識流帶出並不突兀，且發揮了標示故事時間與補述背景的效用。內容提到會社強購原住民水田，引進日本農民改植甘蔗，給原住民地主的租穀卻不敷原有收成，導致糧食不足，族人淪落到河邊浮覆地開墾糊口。

二〇年代報紙上關注臺東廳原住民土地議題的報導不多，但連溫卿寫於 1928 年的未刊稿〈日人土地收奪所演出的兩事件〉，揭露瑪蘭社被強逼蓋印、強購的事件，卻與〈平地蕃人〉情節有高度相似性：

モーカン

<sup>15</sup> 原文：台灣人（支那系），伊藤係指閩、粵籍漢人移民。

臺東製糖株式會社曾於 1927 年 12 月中，在臺東廳瑪蘭社派出所召集山地人令其承諾墾耕，強逼蓋印，這強制蓋印記繼續連互 4 日，由此可以說，強制蓋印就是與強制買收並無二致。這是「蕃地之開發」，「讓蕃人之授產」的切切實實的真相。其結果瑪蘭社耕地三分之二經已變成蔗作。但 1928 年之甘蔗買收價格大約 3 圓，若以此和西部臺灣之買收價格相較一下，也不過纔得達到其半而已。這樣低廉價格又不是交貨後隨即可以領取的，須要等待製糖完竣以後纔能決定，而後始能領取的。<sup>16</sup>

伊藤是否讀過這則稿件無法證實，但批判東糖強購土地、租金低寡、遲付款項等的言論，當時確實有管道被日本作家閱讀，將留待最後一節探討。

回到原住民勞力徵用的議題，根據王學新、許守明的研究，1911 年臺東廳、花蓮港廳收繳平地原住民族槍枝以後，便透過警力的強制，強化勞動力的利用。稅賦徵收則更早開始：1906 年官廳開始對卑南族和阿美族課徵戶口稅，1912 年增加租稅與公課，1914 年增加地租，1923 年施行民法、商法。這一系列將土地與勞動力納入殖民資本體制的措施，使部落自給自足的體系崩解，對資本及貨幣的依賴增加，有利於國家權力續後的治理與同化。當總督府及其在東部支持的日資會社出現蔗農、漁民、移民、技工不足，或需要港口道路水圳建設工人、臺車與鐵道工伙、理蕃討伐勞力時，便徵用平地原住民族，直到三〇年代需求甚大。1924 年東部的平地原住民約有 5 萬人，每年出役總工日高達 110 萬餘日，部分原因是族人無負擔賦稅的能力，故以提供義務勞動作為代償。通常社道的修築、搬運糖包等小工程，每戶出一工，為義務役，遠地的大工程則較為有償役。被徵召者從青年至壯年，須自備鋤頭、擔箕、蕃刀等，必要時也徵用牛隻與牛車。總之，稅賦、勞役、購地被捲入官方主導的東部開發政策，構成一個剝削的體制<sup>17</sup>。這也就是密卡家的耕牛累死、族人集體罷工、密謀逃亡的背景。

<sup>16</sup> 連溫卿，〈日人土地收奪所演出的兩事件（遺稿）〉，《南瀛文獻》4 卷 2 期（1958 年 6 月），頁 23-24。底線為筆者所加。

<sup>17</sup> 王學新、許守明，〈日治時期東臺灣地區原住民勞動力之利用〉，收錄於夏黎明、呂理政編，《族群、歷史與空間：東臺灣社會與文化的區域研究研討會論文集》（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2000 年），頁 78-79、94-102。

製糖會社強賤民田，這主題最早由賴和在〈一桿「稱仔」〉、〈鬥鬧熱〉提出，接著便屬伊藤這篇小說最值注意了。伊藤透過原民土地及耕作權流失的補述，為密卡族人幾乎瘋魔的心情作鋪陳，合理化他們對密卡官方身分的疏離反感。製糖會社在政策獎勵下巧取豪奪，密卡之父、卡姆拉賴伊一家，都在政策運作下被擠壓到常有洪氾的歷史蟲害區耕作。

蝗蟲又稱蚱蜢，伊藤的用詞為「馬側」，即ばった，蚂蚱<sup>18</sup>。台東地區從 1896 年即有嚴重蝗害，1898 年巴塑衛社（今台東大武）、卑南大社都災情慘重：

上個月十二日巴塑衛附近、十七日卑南大社附近都發生蝗害。經報導後認真的進行驅除法，結果巴塑衛附近的水稻比往年減少三分之一，卑南社附近即將要成熟的小米也明顯受害。<sup>19</sup>

蝗災與人禍相映，隱喻掠奪者<sup>20</sup>。卡姆拉賴伊的妻子看著小米穗被遮天蓋地的蝗蟲吞噬。這位卑南族婦女是工具性角色，甚至沒有名字。她無視巡查補密卡的到來，大聲詛咒蝗蟲的一幕，影射了地上的蝗蟲、外來的蠶食者——製糖會社及同化教育。前者掠奪物產，後者爭奪原住民族的下一代。這段客觀補述相當自然，在議題深化上也有加分效果。

第二段為密卡受到移民行禮，自覺與日本人無異時，作者插敘的一段說明：

那是吉田村的百姓。從密卡的部落往北可以稍微看到吉田村。五年前住在村子裡的三百戶百姓，現在只剩下不到一百人。卑南製糖會社為了獲

<sup>18</sup> 1896 年即有東亞飛蝗自菲律賓遷飛侵襲台灣的紀錄，至 1946 年有 7 次明確記錄東亞飛蝗自菲律賓遷飛至台灣的紀錄，台東在 1896 年、1904 年、1923 年遭受災害，以甘蔗、稻米、小米等禾本科植物為食；此外，另有斑角蝗（Sugarcane grasshopper）大發生為害甘蔗的情況，成蟲於 7 月初出現，8 至 10 月間產卵於土中，成蟲與幼蟲群集食害蔗葉，嚴重時只剩餘中肋。參見劉久弘、楊平世，〈臺灣的蝗蟲禍害史〉，《科學月刊》38 卷 6 期（2007 年 6 月），頁 454-458。鄭文義，〈斑角蝗〉，收錄於台灣糖業研究所編，《臺灣甘蔗病蟲鼠害圖說》（台南：中華民國蔗糖技術學會，1991 年），頁 22。

<sup>19</sup> 無著撰人，〈臺東方面之蝗蟲被害〉，《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7 月 8 日，第 2 版。原文日文，筆者中譯。

<sup>20</sup> 〈平地蕃人〉描述蝗害掠奪部落作物的段落，諸如「這些該死的蝗蟲！把小米都給吃光了」、「密卡的眼前不時倏忽轉暗。一大群蝗蟲低空掠過，就像詛咒他們悲慘的生活一般，遮蔽了密卡的視線。」見〈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頁 152。

得原料，光靠不熟悉蔗作的平埔<sup>21</sup>是不夠的。卑南三百噸的新式工場好不容易成立了，沒有原料的話，也只是放著生鏽罷了。製糖會社在那裡資助過去官營移民事業失敗的總督府成立了移民村，在五、六年前趕製了三百戶的平房。……。

……。移民村成立的第二、三年遭遇了暴風雨。那是臺灣特有的暴風雨，飛沙走石像子彈般擊中樹幹。一年之內，親手種植的甘蔗從根部整個被折斷，遭到雨水沖刷而腐爛，一半的移民就此喪失了機會。

移民村由於水質不良，病人總是一個接一個。瘧疾流行的時候，也有無數人死去。

會社並不讓移民們種植甘蔗以外的作物。就算想種，但是缺少水渠也就無法開田。而所種植的甘蔗是依照所謂「原料採集區域」的制度，不能賣給會社以外的人。賣出的價格只能由會社單方面決定。

甘蔗的價格被殺得很低，卻得從會社購買高價的米，……。〈〈平地蕃人〉〉，頁 154。）

這一大段，作者跳出來說明會社成立私營移民村，以及移民無法自主轉作稻米、決定蔗價、米貴糖賤等糖業霸權的補述，似為內地讀者補充台灣知識，但過於突兀。

第三段為會社為控制生產成本而壓迫農民冒雨搶收時，從原住民農民的視野插敘的一段：

胖子在每天第一號搬運車回來時，便從車上抽出各處田裡的兩、三根甘蔗擺在汽罐車的煤炭上。工場的原料係長將這傢伙榨出來的汁用糖分測定器加以檢測，以此來決定當天的採收區域。決定了的區域不管發生什麼事，都必須進行採收。〈〈平地蕃人〉〉，頁 160。）

岔出後回收的這段補充簡短自然，伊藤透過製糖流程的時間壓力，呼應農民們被機械時間規範的苦勞。透過不斷堆疊焦躁與衝突事件，啟動讀者與農民的共感，準備迎來故事結尾的引爆點。

<sup>21</sup> 本段引文中，林蔚儒將ペイホ譯為平埔族，筆者依據原文改為平埔。

第四段為農民商議逃亡時，作者插入的評斷：

在他們的種族當中，居住在甘蔗地帶的部落是最為悲慘的了。沒有人想要住在這樣的土地上。要是想移居到好一點的地方，就必須交出四頭牛給（警官），而被奪走的牛則被（警官）叫平埔加以烹調用來款待內地人。要是（無償）被使役的他們大部分都逃跑的話，最後卑南製糖會社就無法經營下去了。（〈平地蕃人〉，頁 162。）

未使用人物視角而直接帶出的這段作者補述，理念先行，是第二個敗筆，但仍有助於讀者理解「平埔蕃」比「高山蕃」較受官廳信賴，但也飽受壓榨的處境。

說話體與客觀補述，交錯刻劃主人公的見聞覺知。說話體以眾聲喧嘩，呈現底層農民的集體感受；客觀補述則由人物視角或作者說話，解說殖民地議題。某些客觀補述顯得生硬，誠如林蔚儒所言有如教科書式的解釋<sup>22</sup>，但此亦顯出民族壓迫議題的剖析與傳播，正是伊藤的堅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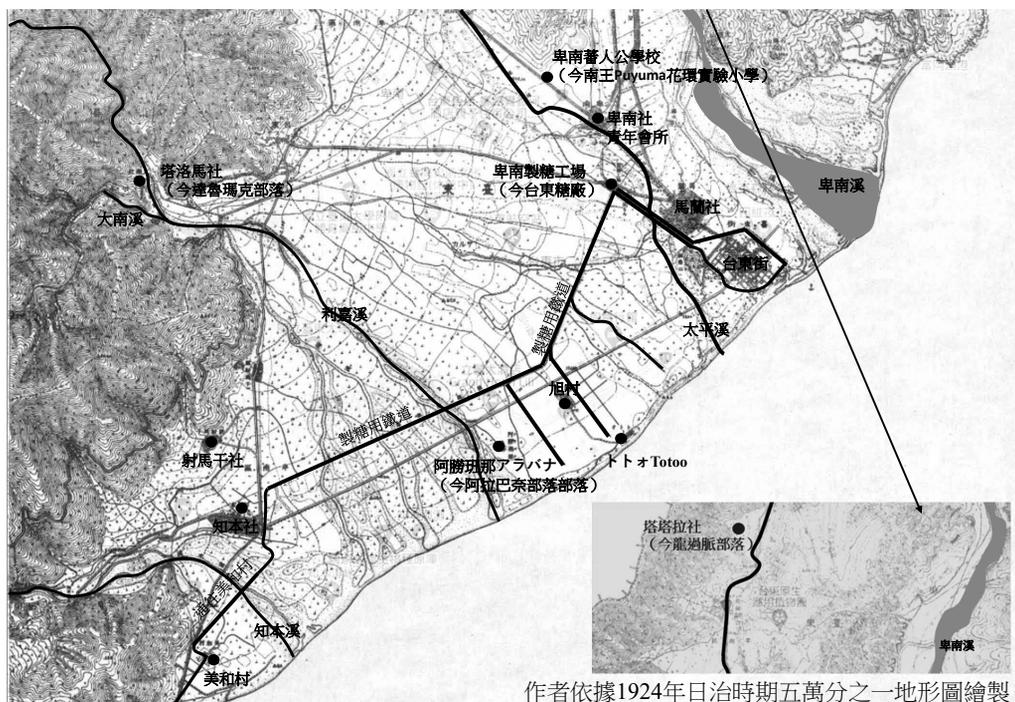
#### 四、馬當原野：〈平地蕃人〉的小說空間與主要地景

本節參照 1924 年〈日治時期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嘗試重構小說中的空間、地景與部落（參見圖一）：

小說空間以臺東製糖會社進駐墾殖的臺東廳<sup>23</sup>（1920 年之前的卑南街和之後的臺東街）南部為範疇，包括臺東街、馬蘭、旭村三區。製糖會社、吉田村、卑南大溪、臺東街、原住民部落（塔塔拉社、塔洛馬社）、蔗園、製糖專用鐵道，是重要地景。以下分別介紹。

<sup>22</sup> 〈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頁 75。上段引文中，括弧中復原的文字，在原作中以伏字呈現。林蔚儒將ペイボ譯為平埔族，筆者依據原文改為平埔，平地蕃當時的另稱。

<sup>23</sup> 1897 年 6 月臺東支廳由臺南縣獨立為臺東廳，1920 年 10 月與里壠支廳合併為臺東支廳。



作者依據1924年日治時期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繪製

圖一：〈平地蕃人〉的小說空間與主要地景，劉柳書琴繪。

(一) 製糖會社：小說以「卑南製糖會社」影射臺東製糖株式會社（1913-1945，簡稱東糖）及其下的卑南工場。東糖，以臺東平原為採收區域，1913年合併野田製糖、新鄉製糖，以種蔗製糖、移民開墾、鐵道建設為三大事業。小說中提到的卑南新式工場，即臺東糖廠前身，1915年11月竣工，但因自然環境與人為因素，移民事業與製糖成績皆不理想<sup>24</sup>。1921年因總督府要求整頓，東糖將資本金減半為175萬，以另外50萬設立臺東拓殖株式會社（1921-1937，簡稱東拓）。1922年東拓將鐵道事業交由總督府收購，成為臺東鐵道的南段，專注於移民和開墾<sup>25</sup>。另一方面，東糖的土地事業卻成績斐然，主要因為承辦私營移民。

<sup>24</sup> 吳育臻，〈臺灣東部的區域差異——從國家治理與糖業經營的觀點（1895-1945）〉，《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47期（2011年12月），頁77。阿美族馬蘭社的情況，可資參考。

<sup>25</sup> 臺東製糖事業的自然條件障礙有：一、常遭暴風雨侵害：1912年、1913年和1919年的災害尤為嚴重。二、卑南大溪、呂家溪、北絲蘭溪、鹿寮溪、新武路溪等河川，平時枯水磊磊巨石，妨害開墾與農耕，一旦豪雨即氾濫成災，平地荒廢、鐵道破壞、道路潰決，無法搬運原料。參見佐藤吉治郎編，《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臺中：臺灣新聞社，1926年），頁189。

1917 年總督府對從事內地農民移住的企業，提供各種補助和保護，並將東部未開發的移民預定地以收容移民為條件交付開墾。結果臺東廳下縱谷平原的大小集團，在短短兩年間全為東糖占有<sup>26</sup>。東糖與東拓從事的製糖與開墾事業，多與移民引進及土地圈購有關。兩大拓殖企業支配臺東平原的經濟生產與社會結構，改變空間地貌與人文生態，在本篇小說中被表現為沉默巨大的反派角色。

1916 年卑南工場設置後，臺東製糖以 3 萬元向馬蘭社購買 300 甲土地，辦理內地人移民，《臺灣日日新報》曾加以宣傳：

今後終於能繼續進行以會社為主的獨力移民，當局也明白其要旨，並決議在卑南通往花蓮港的輕型軌道沿線，大約 7000 甲的鄰近未開墾原野實施民社金錢貸予。從前作為官營移民預定地的，旭村附近的 200 甲以上肥沃耕地，也已向馬蘭社蕃人交涉並完成收購。作為公司自耕地，從本期開始能見到植栽，以及在 7000 餘甲原野上忠勤開墾的越後移民，預期臺東製糖會社將會成為臺灣糖界的一股勢力。<sup>27</sup>

越後移民指 1916、1917 年從新潟、長野招徠的農民，也就是小說中「不知打哪兒來的，任意地將水田改作甘蔗田」的「內地人百姓」。伊藤稱移民為「百姓」，以區別於他對平地原住民的稱呼——農民。

(二)內地人移民：1916 年卑南工場開始第一回製糖，同年季節性的日本內地短期移民抵達，成立旭村。旭村原為官辦移民，由東糖承接後改為私營移民村，1917 年起在海邊的宮濱（トトオ）搭建 30 戶家屋，成為永住性移民。1919 年增為 37 戶 124 人，8 月遭颱風侵襲，家屋全倒，鐵道損壞，甘蔗原料減收 40%，風土病流行。1920 年遷到離海岸稍遠的豐里，另建新村。新村以每戶面積一分為原則，形成集居形態，有濃厚的日本農村風味，設有青年會、處女會，每月於青年會館召開村民大會，遇年節則辦理摔跤競賽等。村民 80% 來自新潟縣，和東糖

<sup>26</sup> 施添福，〈日本殖民主義下的東部臺灣：第二臺灣的論述〉，《臺灣風物》67 卷 3 期（2017 年 9 月），頁 77。

<sup>27</sup> 無著撰人，〈臺東製糖之前途 株直十二圓臺の好況〉，《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3 月 7 日，第 2 版。原文日文，筆者中譯。底線為筆者所加。

訂立契約，每戶可得讓渡田 1 甲園 2 甲，但種蔗面積須達 60%，且多年後才完成讓渡。這就是小說中提到的，移民被契約束縛的背景<sup>28</sup>。

(三) 吉田村：小說中的吉田村，位於密卡家的部落與臺東街之間，能遠眺卑南糖廠的煙囪，離鐵道不遠，是製糖會社為因應本地勞動力不足，而招募移民興辦的 300 戶村莊。吉田村的原型來自旭村。旭村位於阿美族所稱的馬當原野（マタン原野／馬當原野）西段，又稱呂家原野，1919 年底內地人戶數已有 228 戶、本島人 110 戶。這與小說中移民來到後的第二、三年，颱風折損半數住戶，居民不到 100 人的描述相符<sup>29</sup>。作者將吉田村的地理位置設定於 1920 年重建的旭村，村的沿革也借用了在宮濱的艱辛草創史。

(四) 臺東街：從旭村北渡太平溪（大巴六九溪），能抵達政經中心臺東街。此一政經中心座落於卑南大溪到太平溪的沖積扇，清末形成漢人街廓，稱為寶桑庄。此地有密卡任職的卑南警官派出所，以及製糖會社支助的卑南教會（臺東基督長老教會建於 1924 年，宣教活動則更早開始）。密卡 13 歲就讀公學校時，就從其寄居的萊沙家部落的「少年公廨」通勤到此地<sup>30</sup>，為西裝筆挺的牧師口譯而意氣風發。

(五) 蔗園：卑南工廠的甘蔗原料區，位於太平溪到利嘉溪（呂家溪）的下游，屬於馬當原野東段，原是馬蘭社的主要水田區。小說中將貫穿這些獨立水系的卑南圳支線，泛稱為卑南大溪的支流。作者透過從小在此生長、耕作的密卡之眼，追溯這一大片良田的主人，從日本人那裡習得水稻栽種技術，不出十年卻在糖廠要求下被賤走土地。一〇年代後期開始變成會社農場的馬當原野，就是故事的舞台。

(六) 製糖專用鐵道：以卑南工場為輻湊點，包含卑南線和知本線，連結臺東街、馬蘭社與美和移民村；南北縱貫，貫串卑南大溪、太平溪、利家溪、知本溪等氾濫不定的流域。小說中指的糖業鐵道推測為知本線，從鐵道到會社煙囪之間大部分變成會社土地。密卡憶起自己的父親、萊沙的父親在此耕田的往事，由於鐵道興建徵用已不再可能。密卡，在被強賤的土地上來回尋找萊沙。這裡亦是

<sup>28</sup>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移植民ニ關スル調査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1935 年），頁 304-305、323-324。

<sup>29</sup> 同註 26，頁 81-82。東糖從一〇年代起，曾開設旭、鹿寮、鹿野、池上等日本移民村，又從台灣西部招徠本島人移居到大原、月野、德高班、萬安等地。

<sup>30</sup> 伊藤筆誤為蕃童小學校，應為公學校。少年公廨（こうかい），卑南族未婚男子的會所。

他仰望煙囪、鐵道、日本專員，領受炙暑、蝗蟲、田鼠、機關車煤煙、狂風暴雨的原料區。這個充滿記憶、情感、權力的象徵性空間，也就是支配主人公和所有農民的——命運的蔗海。

(七) 原住民部落：密卡家的部落可以北望吉田村，據此推測為卑南族的射馬干社（Kasavakan，今建和部落附近）或知本社（Katatipul，今卡大地布部落附近）。知本社鄰近溪流與水圳，更貼近小說中的一些描述。塔洛馬社為魯凱族的大部落，今達魯瑪克部落（Taromak）的前身，位於大南溪山麓。大南溪為利嘉溪的上游<sup>31</sup>。塔塔拉社（Danadanaw）為卑南族部落，位於卑南大溪中游的北絲鬮溪支流沿岸，是故事中小人物「日本」的家鄉<sup>32</sup>。

伊藤以製糖會社的附屬設施（糖廠、鐵道）、原料區、移民村、教會、學校、警官派出所為符號，描繪糖業資本支配下的新地方社會。他以煙囪隱喻資本主義，以火車頭隱喻工業壓迫，以製糖鐵道描寫生產掠奪，以原料專員刻劃族群／性別壓迫。藉由權力化的地方空間，他嘲弄總督府的糖業保護政策及其獎勵會社辦理內地移民等措施，揭露官方助長資本家圈地、役使原住民、剝削內地貧農的事實。這篇作品令人想到 1927 年由今和次郎提出，著重當代風俗人情調查的考現學式風俗描繪<sup>33</sup>。伊藤出色的地誌刻劃，超前地寫出了被納入殖民體制的掙扎者群像。在他的理解中，製糖會社導入的經濟轉型並非成功且不成熟，使多種族群在不義的結構下接壤交鋒。透過這樣的舞台，他成功描寫了原住民傳統領域被會社壟斷、自給式生產瓦解的面貌，以及新世代承受的政策改造與同化壓力（譬如，密卡夜宿公廨時的崇外言論，不被長老認可等）<sup>34</sup>。

<sup>31</sup> 根據《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中的「系統別分布地圖」，塔洛馬社在日治時期是魯凱族部落。參見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二冊（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2年），書前附圖。

<sup>32</sup> 卑南族共有八個主要部落，日治時期被稱為「八社蕃」，包含知本社、射馬干社、呂家社、大巴六九社、阿里擺社、北絲鬮社、卑南社、賓朗社。塔塔拉社，今卑南鄉明峰村龍過脈部落的前身，是後來由舊稱北絲鬮社的初鹿部落再移居的聚落，在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的「系統別分布地圖」，也屬於卑南族。參見註 31；以及，林修澈主編，《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年），頁 590-592。

<sup>33</sup> 參見今和次郎，《日本の民家》（東京：岡書院，1927年）。

<sup>34</sup> 〈平地蕃人〉中密卡因崇外言論不被長老認可的段落如下：「密卡總是得意洋洋地訴說自己這一天是如何的替身穿筆挺西裝的優秀牧師進行翻譯。儘管看守的長老以不悅的臉色斜睨著他們」。參見〈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頁 152。

說明故事的空間與地景之後，接著要考察標題「平地蕃人」的所指？小說中使用平地蕃、土民、臺灣人（自注：モーカン）、日本人百姓、內地人移民、百姓等泛稱，未使用個別民族稱呼（譬如卑南族），直接以部落名字稱之。何謂「平地蕃人」，清政府將東台灣的原住民分為「平埔」、「高山」兩大類，阿美、卑南族皆屬平埔：

臺東本番地，土著皆番人；以居平地，稱「平埔番」。客民則閩、粵人，自前山來者居多；北路，則宜蘭人居多。其俗，皆因其舊；前山各廳縣志已詳，不須贅也。故專採訪番俗記之。<sup>35</sup>

至日治初期田代安定的東台灣人群分類，改用生蕃（平地蕃＋高山蕃）與熟蕃（平埔＋加禮宛）兩類，其下細分「支那人」、「熟蕃平埔人」、「熟蕃加禮宛人」、「平地蕃阿眉」、「平地蕃卑南」五種<sup>36</sup>。綜合上述，清末至日治初期，阿美族、卑南族的他稱有「平埔」、「平地蕃」，但與遷入本地的西拉雅、馬卡道、大武壠等「熟蕃平埔人」（化蕃）所指不同。

王泰升在研究「平地蕃人」的法律待遇時，也清楚說明其與「化蕃」的差異：

此不同於前述化番因「進化」而為蕃地改編、擺脫蕃人身分，故以這些阿美族或卑南族居住於花東縱谷和東部海岸線平坦地帶而稱為「平地蕃」。其後在法律上即以「平地蕃人」，稱這些居住於普通行政區域的生番／高山族原住民，一直到日治結束。<sup>37</sup>

「平地蕃人」是在內地人、本島人、平地蕃、熟蕃、化蕃、生蕃的分類脈絡上，制定的法律身分，戰後改稱平地山胞、平地原住民族。1914年隨著普通行政區的明確劃界，「平地蕃人」專指被區內的阿美族和卑南族，有別於「化蕃」、「熟蕃」等以同化觀點進行的分類和稱呼，但仍屬「生蕃」。黃唯玲指出：平地蕃人

<sup>35</sup> 胡傳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東州採訪冊》（台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3年），頁139。

<sup>36</sup> 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1900年），頁57-58。

<sup>37</sup>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上的原住民族：作為特殊的人群、地域與法文化〉，《臺大法學論叢》44卷4期（2015年12月），頁1662。

「乃是居住於普通行政區域的生蕃」，「雖屬普通行政區域內，然非完全屬於普通行政的範圍」<sup>38</sup>。李玉芬也提及官廳對「平地蕃人」與本島人同一處理，給予土地業主權，但業主權的查定過程導致部落耕地和於法無效領域大為縮小<sup>39</sup>。由此可見之，「平地蕃人」在族群類屬（生蕃）與法律權益（比照普通行政區內的漢人）上，面對雙重標準，除了遭受歧視也造成實質權益的損失。

伊藤只在小說標題中使用「平地蕃」一次，正文都用「ペイボ」（平埔）。在他的故事中，呈現如下一幅由上而下的族群階序：

- （一）內地人／日本人／百姓／移民：文中會社員工、搬運夫、日本移民
- （二）臺灣人／モーカン（平地人）／支那系：文中指漢人、閩粵移民
- （三）惡漢／バイラン（歹人）：文中原指不肖漢人，後挪用於平地蕃人
- （四）平地蕃（ペイボ／土民）：文中指卑南族、魯凱族
- （五）生蕃：文中指高山蕃、平地蕃人

事實上，「平地蕃人」是臺東平原上主要的耕地擁有者，東糖成立後也是會社大量種蔗、滿足新式工場原料需求的根本勞力。二〇年代中期以前，臺東廳的漢人不多，之後才較多移入，包含恆春的平埔族，故日治初期臺東平原上的平埔族也數量有限<sup>40</sup>。反之，馬當平原在一〇年代已有水田百餘甲，阿美族、卑南族為主要人口。馬蘭社人每天駕著牛車前往耕作，晨昏時分清亮的牛鈴聲、輪軸聲，和男女的吟唱飄蕩<sup>41</sup>。鈴木祐子也指出 1938、1939 年伊藤將〈平地蕃人〉收錄到《娘地主》、《燕》時，也將「ペイボ」明確改為「平地蕃人」<sup>42</sup>。凡此皆可證明，伊藤描繪的並非「平埔族」。

<sup>38</sup> 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臺灣史研究》19卷2期（2012年6月），頁118-121。

<sup>39</sup> 李玉芬，《消失中的都市部落？臺東市馬蘭社阿美族生活空間的形成與轉變》（高雄：麗文文化，2007年），頁141。

<sup>40</sup> 平埔族在清末短暫遷移到臺東平原後便向北遷移，根據鄭全玄的考察，來自西部的平埔族受到卑南社勢力的威脅，並未在臺東平原定居。參見鄭全玄，《台東平原上的移民拓墾與聚落》（台東：東台灣研究會，1995年），頁27-29、90。

<sup>41</sup> 同註40，頁90。

<sup>42</sup> 鈴木祐子，〈日本統治期台灣原住民文學の原典——「魔鳥」「平地蕃人」「蕃人ライサ」の同時代受容分析〉（台北：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年），頁88、101。

「平地蕃」文化身分與法律身分的分歧，是日本專員以「惡漢」、不肖漢人、不似漢人、歹人、壞人，加以歧視；又以「生蕃」非「熟蕃」、不文明，加以侮辱的根據。這篇小說中沒有漢人角色，但曾提及「歹人」一類負面人物；多次刻劃日本移民但總是賦予卑屈形象，凡此皆為突顯卑南族人物主體性的設計。在總督府和製糖會社的重層支配結構下，作者透過次等警察之眼（原住民巡查補）同理次等本島人（平地蕃），再現族群與性別歧視的結構，以及族人正在蓄積反抗（偷留麻繩）或準備遷逃的危機四伏。

小說最後日本專員意圖欺侮萊沙，密卡前往制止。被激怒的專員咆嘯，對密卡祭出了極致的挑釁——

バイランバイラン  
歹人歹人……畜生！ 惡漢惡漢……畜生ッ！  
你憑什麼管那麼多，生蕃！ 一体誰にことつて来た、生蕃め！  
せいばん  
（〈平地蕃人〉，頁 163。）

專員挪用原住民批評不肖漢人的用語「歹人」加以汙衊。這句話以雙向的汙名，架空並異化了「平地蕃人」。作者透過萊沙的衣著打扮，點出平地蕃人「似漢非漢」的法律身分。在適用普通行政區法律方面，他們有義務和本島人一樣承擔賦稅，因現金缺乏衍生出「以役代稅」的負擔；在社會生活上，卻和「生蕃」一樣遭受歧視，許多權益遭受損害。小說至此也將平地原住民族在土地、勞役、性別和法律上遭遇的重層剝削，表現得淋漓盡致。

## 五、綠色的眼淚：臺灣文化協會等團體的糖業批判論述

伊藤永之介為農民而流的眼淚，聚焦在平地原住民族生產型態的崩解。他是第一位以小說描繪臺東平原的作家，他沒有到過台灣，那麼是如何認識台東的呢？

根據林蔚儒的調查，保存於秋田縣鄉土文獻資料館與縣立圖書館的伊藤文獻中，有不少創作筆記和剪報。儘管目前僅存「霧社事件剪貼簿」和「臺灣風景照片冊」，沒有與〈平地蕃人〉相關的素材，但透過剪報可知《臺灣日日新報》是他寫作的重要參考，可能來自在台友人的剪輯寄送<sup>43</sup>。

<sup>43</sup> 〈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頁 80-86。

事實上，伊藤不只一次利用報紙把握重大社會事件，藉此處理台灣、朝鮮、「滿洲國」的農業爭議。他發表於 1931 年 10 月的小說〈萬寶山〉也是一例，他自述：「在萬寶山事件發生後僅僅二、三個月間所完成的這部作品，不可思議地，竟不像是新聞報導一般的東西，而受到宇野浩二的讚賞。」〈平地蕃人〉完稿後，他隨即著手〈萬寶山〉，同時搜集報上的霧社事件消息。儘管最後他因傾力於萬寶山事件的書寫，而未完成霧社事件小說，但透過報紙鑽研殖民地議題的作法未曾改變：

我持續地閱讀有關殖民地的文獻、蒐集相關材料，從臺灣開始到滿州再到朝鮮，寫了四、五篇的殖民地物。當然這段期間也不是沒有撰寫像前述的〈恐慌〉那樣不同系統的東西，也有寫與殖民地物並行的，取材於農民組合、當時流行的所謂爭議小說，但大致上我做為作家的關心，是流連在殖民地上的。<sup>44</sup>

伊藤也關注日本農民組合運動，那麼他對東糖議題的見解，與《臺灣日日新報》反映的官方輿論有何不同呢？是否還參考了其他資料？對此，我們可以透過比較《臺灣日日新報》（1916-1926 年）、佐藤吉治郎《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1926 年出版）的相關論述，釐清伊藤的論述立場與另類觀點。

〈平地蕃人〉的故事時間，林蔚儒依據花東鐵道（璞石閣——里壟）修建的情節，推測在 1921 年至 1926 年期間<sup>45</sup>。筆者則依據製糖會社趕建 300 戶移民村是在「五、六年前」，進一步同定位故事時間為 1922 年，背景補敘則上溯到 1916 或 1917 年，這正是東糖營運不良的時期。1922 年，是總督府收購東拓的鐵路事業，主導臺東鐵道工程的一年。這一年是旭村的移民開始依約取得讓售地 1 甲 5 分、永久耕作地 2 甲，是開始有基本保障的時期<sup>46</sup>；也是卑南街改制為臺東街的過渡期（1920 年改制）。這也是為何小說中，同時出現卑南、臺東兩個稱呼的原因。比對

<sup>44</sup> 以上兩段引文，皆引自伊藤永之介著，林蔚儒譯，〈文學自敘傳〉，收錄於〈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頁 168。

<sup>45</sup> 同註 43，頁 60。

<sup>46</sup> 旭村日本移民的生活，要待貫穿豐里地區的卑南圳第四支線的完成，1933 年至 1938 年田園開墾面積增加，以及 1941 年獲得原野地放領許可以後，才安定而顯出朝氣。參見鄭全玄，《台東平原上的移民拓墾與聚落》（台東：東台灣研究會，1995 年），頁 99。

《臺灣日日新報》可以發現，伊藤對於東糖遭遇蟲害、暴風、歉收，移民生活困頓的消息，往往直接融入小說中，譬如 1923 年臺東製糖蔗作欠收、1926 年綿蚜蟲發生等<sup>47</sup>，有關氣候、災害的報導都被融入環境描寫中<sup>48</sup>。反之，對於會社前景良好的消息，或有利於臺東製糖會社拓墾、移民的報導則不採用。由此可見伊藤的策略，是將符合其批判觀點或透露弱勢階層處境的信息納入，將為財團美言的宣傳忽略或戳破。〈平地蕃人〉有意質疑這時期出版的糖業發展專書，譬如臺灣新聞社 1926 年出版的佐藤吉治郎《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為經營不善的臺東製糖會社美言，認為東糖開發東部的作為是響應總督府的「使命志業」，非僅「營利」而已：

由來花蓮港廳下，海岸缺乏碇泊的便利，山地有兇蠻的暴威……花蓮溪原野茅草深鎖，開發此地是難中之難，到底不是尋常資本家所擅長的……「東部糖業的開發就是東部的文化開發」……東部兩工場對東部臺灣的開發著有貢獻。<sup>49</sup>

佐藤力陳東部殖產在經濟面「必然失敗」是非戰之罪；並誇言即便如此，東糖仍為「開發臺灣東部的文化」努力，牽強地規避了企業經營層面的評價：

臺東製糖株式會社——為東部開發的使命而出世。臺灣改隸的意義之一為開發富源與招徠內地移民，為呼應總督府的使命，男爵安場末喜等發起設立臺東製糖株式會社。<sup>50</sup>

將東糖的功績抬舉到協助總督府「引進內地移民」、「開發富源」的層次，而未指明糖業如何在獎助與保護的政策下，在損害台灣人權益的體制裡，強制或半強制

<sup>47</sup> 參見無著撰人，〈臺東製糖の蔗作狀況〉，《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10 月 18 日，第 2 版；無著撰人，〈臺東廳下全蔗園に綿蚜蟲發生，旭村被害劇甚〉，《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5 月 10 日，第 1 版。

<sup>48</sup> 原料產量到三〇年代以後才逐漸增加，參見無著撰人，〈本期產糖高（新式工場） 千五十七萬二千擔か 歩留一割四分一厘強に達す 前期より二十九萬擔の増〉，《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5 月 22 日，第 5 版；無著撰人，〈新式製糖工場 今期の產糖實績 一千八百廿八萬餘擔〉，《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7 月 7 日，第 3 版。

<sup>49</sup> 佐藤吉治郎編，《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臺中：臺灣新聞社，1926 年），頁 36。原文日文，筆者中譯。

<sup>50</sup> 同註 49，頁 188。原文日文，筆者中譯。

施行的事實。《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有意製造輿論為東糖開脫，其主要論點為：廳下戶口稀薄，缺乏勞力，占大多數的原住民蔗農不容易指導啟發，且因交通不便，預測不到的災害層出不窮，難關接續而來，終至勞多而無效，製糖事業遲遲無進展。該書也影響了當代的東臺灣研究，鄭全玄《臺東平原上的移民拓墾與聚落》(1995)一書提到「使命論」觀點<sup>51</sup>；吳育臻〈臺灣東部的區域差異〉(2011年)一文，呼籲研究者考量前後山狀況與花東差異，不要「概括的認為日本人在臺灣的糖業經營就是資本主義的展現，日本資本家是資方，臺灣農民成為被剝削的對象」<sup>52</sup>。但若從當地族群的觀點來思考東部糖業發展的經過、性質及影響，我們又將獲得怎樣的結論呢？

佐藤論著的材料來源與屬性為何？臺灣總督府「建設臺灣東部為日人生活新天地」的基地論，對當地生態與族群存續的影響為何？臺東製糖會社成立的第一個十年，用什麼手段開發，在人權和文化上可有建樹與投資？答案都是否定的。與佐藤一書性質相似的《臺灣糖業概觀》、《日本糖業發達史》<sup>53</sup>，與官方及製糖會社同樣有利益關係。會社使命論、原住民金錢欲望缺乏說，這些論述最初的脈絡，是否為製糖會社申設階段的單方面說帖？這些並非本文目的，從小說的實踐來看，伊藤明顯不認同這種掠奪式的開發，故未採納相關出版物的論點和素材。〈平地蕃人〉同理原住民族，踢爆財閥自肥的一套論述與文化再生產。這篇小說在「東部開發」議題上，至今仍值得我們反思。

<sup>51</sup> 同註46，頁64。

<sup>52</sup> 吳育臻，〈臺灣東部的區域差異——從國家治理與糖業經營的觀點(1895-1945)〉，《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47期(2011年12月)，頁69。論者提到：「花蓮港廳和臺東廳各有一個製糖會社經營糖業，其經營的源由基本上並非全然是資本主義的，而是以開發東部做為企業經營的使命，並附帶些許資本主義的特質。」見同論文，頁68。

<sup>53</sup> 此類書籍另有：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臺灣糖業概觀》(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1927年)；河野信治，《日本糖業發達史》(東京：糖業發達史編纂事務所，1930年)等。有關臺東製糖會社創立初期生產面臨的遭遇與困難，則早在《臺灣日日新報》已有不少報導，譬如：無著撰人，〈臺東の開拓〉，《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1日，第4版；無著撰人，〈臺東製糖大革命〉，《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0月3日，第2版；無著撰人，〈臺東製糖の前途 株直十二圓臺の好況〉，《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3月7日，第2版；無著撰人，〈臺東製糖移民 內地人約一千六百名を〉，《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1月2日，第2版；無著撰人，〈民營移民旺盛 臺東製糖の大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3月28日，第2版。

伊藤對於台灣糖業問題的認識，使我們有必要追蹤他寫作這篇小說前二、三年，台灣人報刊上一些批判東糖的文章。最早關注臺東支廳土地正義議題的是臺灣文化協會、新文協及農組的人士。以下試舉陳逢源、簡吉及一篇未署名的文章，探討他們可能對當時讀者或伊藤永之介產生的影響。

《臺灣民報》的共同創立者、擅長經濟問題分析的陳逢源，曾有批判東糖的論述。1926年5月他在〈東臺灣事情一斑〉的數千字論文中，歸納製糖會社帶來的問題。針對旭村、鹿野、鹿寮、池上的農民貧困問題，他歸納原因有四：一、農業原是很薄利的事業，在經濟條件不好的東部，又有個圖利的會社居中賺走一手賸耕料（利息）。二、移民開墾的土地最後歸會社所有，使農民缺乏持續努力的動機。三、臺東廳土地大都沒有水利，土質又貧瘠，不比花蓮港廳。四、臺東廳缺乏官營移民辦法的有力保護，移民生活環境不良且漸次敗壞<sup>54</sup>。他還透過統計數字，舉證移民村戶口數、人口數下降，各戶收益遠不及花蓮港廳的官營移民，並作出「此後若沒有加以積極的保護，一定難得挽回其大勢了」的結論<sup>55</sup>。陳逢源對於東糖剝削移民的分析，與伊藤對於吉田村的塑造有相符之處。

農民運動領袖簡吉，也曾在1928年5月新文協發行於東京的《臺灣大眾時報》，批判臺灣製糖會社的土地掠奪：

臺灣製糖會社後壁林工場和×××××結托，當時鳳山廳長橫山某指揮×××警察，包圍我們兄弟，以模範農園設置的美名，用暴力×××了兄弟們的三千餘甲的美田良畑。同樣的歷史當然不僅這處，全島到處都有這樣的事實。×××了三千甲的大面積的土地，而基礎鞏固了的臺灣製糖會社，其後的×虐實在令人髮指！<sup>56</sup>

簡吉，曾為臺灣農民組合中央常務委員，1927年與趙港代表台灣，出席日本農民組合第六回大會，並向日本眾議院遞交抗議書。比對後壁林工場以設置模範

<sup>54</sup> 芳園（陳逢源），〈東臺灣事情一斑（四）〉，《臺灣民報》，1926年5月23日，第8-9版。

<sup>55</sup> 1922年四村中只有兩村有微薄收益，旭村純益95圓、鹿寮村純益6圓，池上村虧損42圓、鹿野村虧損24圓。

<sup>56</sup> 簡吉，〈臺灣農民運動〉，《臺灣大眾時報週刊》第2號：「五一」紀念特別號，1928年5月10日，第9-10版。原文日文，筆者中譯。

農場為名，在警力保護下強購農地之案例，筆者推測伊藤在〈平地蕃人〉的議題設定上呼應了農運人士的糖業政策批判，反對政策性的強購與圈占拂下地。

1928年9月2日《臺灣民報》，無署名的〈東部臺灣啟發聲中的臺東移民竟受盡剝削〉一文，則是少數有關本島人移民村遭剝削的報導。該文關注東糖與東拓為開墾土地持續招徠西部移民，在知本社附近成立「美和移民村」，卻未依招募承諾提供開墾貸款，導致移民被迫投入更多家庭人力和資本，甚至變賣老家產業，還須配合以開墾為名的公共勞役：

（移民當時）其約束條件謂：會社對移民要貸與一個年相當的食費農具、及耕牛等的資金。又移民要依會社的指定地開墾三甲以上的土地、將來墾成後要讓渡移民一甲之外、二甲要與移民設定永小作權等云云。雖知移民等移住後，會社僅指定土地條件實行而已，其要貸與金錢的條件，竟拋棄腦後全不實行。移民等因本居地的業產全部變動，欲歸不能，無奈何將賣卻業產的金錢，提出採買農具及建築家屋，協力一致從事開墾，或開鑿水圳灌溉田畑種種，其勞力可謂非常。<sup>57</sup>

引文中，本島人移民被會社主導的開墾體制捆綁，債台高築，且勞力徵用頻仍，正如小說中的情節。伊藤似乎將東糖移民村經營不善招致的批評，不論是對日本人或本島人移民村的，都納入他對「吉田村」的塑造中。

1927年1月，臺灣文化協會發生了激進派與穩健派之爭。文協分裂後，由左派的連溫卿、王敏川掌權，新文協除了延續演講會及劇團演出外，更聯合農民建立共同戰線，積極介入工農運動並創辦《臺灣大眾時報》。不久，該派與王敏川主導的「上大派」不合，臺灣共產黨進一步影響與介入臺灣文化協會及臺灣農民組合，1929年連溫卿一派失去主導權且遭除名。前述連溫卿的未刊稿，是否因此耽擱出版不可知，但該文和《臺灣民報》、《臺灣大眾時報》等批判東糖的文章，無疑是當時關切後山農民生活的重要輿論。

<sup>57</sup> 無著撰人，〈東部臺灣啟發聲中的臺東移民竟受盡剝削〉，《臺灣民報》，1928年9月2日，第3版。底線為筆者所加。

將 1926-1928 年間的紀實報導和虛構文本相互參照，可以推斷《臺灣民報》、《臺灣大眾時報》的東糖批判言論，啟發了伊藤的認識。他有意識地組織了原住民族（被殖民者）與內地移民（少數者）的視角，摒除日資報紙及專書為會社的美言，傳達總督府與財閥聯手支配多族群農民的實情。他以一名「模範原住民」逃不開的民族歧視與製糖產業鏈帶來的壓迫，隱喻糖業如何威脅東部族群的生存。他清楚表達了——日本官財一體的產業體制，是不可能對東部文化帶來發展的。

究竟臺東平原上的民眾主體是誰？他們的基本權益與生活觀點為何？伊藤永之介的答案已毋須贅言。有別於台灣作家的是，他選擇了即便臺灣文化協會也關注甚少的後山議題。密卡的棍棒朝製糖會社的頭上打下，象徵榮升者站回甘蔗奴工陣營，共同反抗糖業殖民主義。伊藤呼應了賴和以降的台灣農民文學，推演一套傳達底層人民視角、聲音和情感的技巧，把日本農民文學關懷的對象推向台灣平地蕃人與跨國移動的農民（少數者）。

## 六、結論

針對日治前期臺東製糖產業引發的社會議題，本文從文本中心論的立場，依序探討了一些課題，包括：伊藤為呈現種蔗土地取得、勞力徵用、外勞引進（日本農業移民），安排了哪些敘事策略？他的說話體、農民群像和客觀補述，在呈現地域生產結構中的族群關係時，有何效果與侷限？他的素材與觀點，受到哪些出版媒體的信息影響，意圖與誰進行對話？

〈平地蕃人〉描繪了大正末年臺東製糖會社的剝削性經濟體制，刻劃了「會社／日本農業移民」、「會社／日本人／平地蕃人」之間的族群互動和階級壓迫。作者以線性結構單一敘事，著墨榮升者的衣錦還鄉如何變調，而失去虛榮的歸家又何以成為真正的歸家。這始料未及的榮歸，讓主人公見證失落。密卡的卑南族視角，逐一連結了魯凱族和日本農業移民的視角，刻劃糖業資本主義支配下的民族群像。伊藤讓平地原住民族帶頭髮聲，道出會社強賤良田、勞役徵用影響家戶生產、農墾現場的性騷擾等問題。他也透過客觀補述法，帶出米糖相剋、同化教

育、部落治安等社會現象。一天一夜，是這位原住民青年經歷群體互動而浮現其主體性的時間。主人公從躊躇滿志的中間階層覺醒，在考驗紛至沓來之後，以關鍵時刻的行動打碎體制規訓，獲得族群的認可。

〈平地蕃人〉呈現的後山糖業議題，在台日小說中並不多見。這篇小說揭露了原住民傭工化的問題，也哀憐日本農業移民的赤貧化。作者針砭政策的火候，來自於他對台灣糖業訊息的關注，也得力於霧社事件後的言論空間。霧社是總督府開發中央山脈林業、礦業的吞吐口，事件起因之一為賽德克人反抗不義役使，與伊藤關注的議題有類似背景。伊藤以書寫想像未曾履踏之地，臺東平原的糖業問題，可謂伊藤身為左翼作家對殖民地弱小民族、日本農民移民的人道聲援。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山部歌津子，《蕃人ライサ》，收錄於河原功監修，下村作次郎解說，《日本植民地文学精選集【台灣編】4》（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年）。

山部歌津子著，黃玉燕譯，《原住民賴薩》（高雄：春暉，2011年）。

井上伊之助，《生蕃記》（東京：警醒社書店，1929年）。

今和次郎，《日本の民家》（東京：岡書院，1927年）。

夏黎明、呂理政編，《族群、歷史與空間：東臺灣社會與文化的區域研究研討會論文集》（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2000年）。

台灣糖業研究所編，《臺灣甘蔗病蟲鼠害圖說》（台南：中華民國蔗糖技術學會，1991年）。

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1900年）。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東京：岩波書店，1929年）。

宇野浩二等著，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別卷）》（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

佐藤吉治郎編，《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臺中：臺灣新聞社，1926年）。

李玉芬，《消失中的都市部落？臺東市馬蘭社阿美族生活空間的形成與轉變》（高雄：麗文文化，2007年）。

林修澈主編，《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年）。

河原功著，張文薰、林蔚儒、鄒易儒譯，《被擺布的台灣文學：審查與抵抗的系譜》（新北：聯經，2017年）。

河野信治，《日本糖業發達史》（東京：糖業發達史編纂事務所，1930年）。

胡傳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東州採訪冊》（台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3年）。

森丑之助，《台湾蕃族志》（臺北：臨時台湾旧慣調査会，1917年）。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二冊（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2年）。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臺灣糖業概觀》（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1927年）。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移植民ニ關スル調査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1935年）。

鄭全玄，《台東平原上的移民拓墾與聚落》（台東：東臺灣研究會，1995年）。

Kristeva, J,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二、論文

### （一）期刊論文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上的原住民族：作為特殊的人群、地域與法文化〉，《臺大法學論叢》44卷4期（2015年12月），頁1639-1704。

安本，〈現代日本文學的潮流：伊藤永之介農民文學〉，《華文大阪每日》5卷2期（1940年7月），頁16-17。

吳育臻，〈臺灣東部的區域差異——從國家治理與糖業經營的觀點（1895-1945）〉，《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47期（2011年12月），頁65-82。

施添福，〈日本殖民主義下的東部臺灣：第二臺灣的論述〉，《臺灣風物》67卷3期（2017年9月），頁55-109。

連溫卿，〈日人土地收奪所演出的兩事件（遺稿）〉，《南瀛文獻》4卷2期（1958年6月），頁16-27。

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臺灣史研究》19卷2期（2012年6月），頁99-150。

劉久弘、楊平世，〈臺灣的蝗蟲禍害史〉，《科學月刊》38卷6期（2007年6月），頁454-458。

## （二）學位論文

林蔚儒，〈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伊藤永之介台灣作品〉（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鈴木祐子，〈日本統治期台灣原住民文學の原典——「魔鳥」「平地蕃人」「蕃人ライサ」の同時代受容分析〉（台北：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年）。

## 三、雜誌文章

伊藤永之介，〈平地蕃人〉，《中央公論》45卷12號（1930年12月），頁68-90。

## 四、報紙文章

芳園（陳逢源），〈東臺灣事情一斑（四）〉，《臺灣民報》，1926年5月23日，第8-9版。

無著撰人，〈臺東方面の蝗蟲被害〉，《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7月8日，第2版。

無著撰人，〈臺東の開拓〉，《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1日，第4版。

無著撰人，〈臺東製糖大革新〉，《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0月3日，第2版。

無著撰人，〈臺東製糖の前途 株直十二圓臺の好況〉，《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3月7日，第2版。

無著撰人，〈臺東製糖移民 內地人約一千六百名を〉，《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1月2日，第2版。

無著撰人，〈民營移民旺盛 臺東製糖の大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3月28日，第2版。

無著撰人，〈臺東製糖の蔗作狀況〉，《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0月18日，第2版。

無著撰人，〈臺東廳下全蔗園に綿蚜蟲發生，旭村被害劇甚〉，《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5月10日，第1版。

無著撰人，〈東部臺灣啟發聲中的臺東移民竟受盡剝削〉，《臺灣民報》，1928年9月2日，第3版。

無著撰人，〈本期產糖高（新式工場） 千五十七萬二千擔か 歩留一割四分一厘強に達す 前期より二十九萬擔の増〉，《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5月22日，第5版。

無著撰人，〈新式製糖工場 今期の產糖實績 一千八百廿八萬餘擔〉，《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7月7日，第3版。

簡吉，〈臺灣農民運動〉，《臺灣大眾時報週刊》第2號：「五一」紀念特別號，1928年5月10日，第9-10版。